

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

鄧拓



K207

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

邓 拓

1717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

邓 拓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诚步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60×1168毫米 32开本 7.76印张 182,000字

1959年11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2版

1979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12,501—57,500

书号 11002·275 定价 0.73元

卷 前 小 语

这本小册子收集了八篇历史论文。前头六篇是抗日战争以前在《新世纪》、《时代论坛》、《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过的；只有后头两篇是全国解放以后在《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年月里，没有时间研究历史，不可能写历史论文。全国解放以后，重新接触到历史问题，才又写了两篇。

现在看来，这些论文虽然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从古代奴隶制度的问题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的问題，提出了个人的一些见解；但是，这些论文毕竟是很不成熟的，其中有许多重要论点，不但没有全面地充分地展开，而且还有不妥贴的地方，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

那末，为什么现在又把这些论文收集付印呢？因为关于中国历史的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学术论坛上已经争论了二、三十年。这种争论实际上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当时的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激烈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许多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的反动论点早已被粉碎了。争论的问题中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或者接近于解决，有的是人们认识还很不一致的。现在应该到了进一步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现在许多学者在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完全应该也可以在学术自由讨论中互相了解 and 接近起来，即便不能完全一致或者仍有根本分歧也没有什么

关系。我之所以同意把自己过去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论文，重新整理付印，一方面是为了督促自己作进一步的探讨，另一方面也希望由此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应该声明，这些论文的内容不免会有许多错误，只能作为学术讨论中的参考，决不能作为历史教学的参考。我自己对于过去所写的这些论文也不满意，但是，在这一次整理的时候，只做了一些修改（包括标题和文字的修改以及按照新版本查对了经典著作的引文），而尽量保持这些论文原有的形式和内容，希望读者把它当做百家争鸣中的一种观点和一部分历史资料来看待。至于这些论文所引用的历史资料，因为数量很大，不能一一重新核对，这也是应该声明的。

在这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还想进一步建议学术界的朋友们把过去的学术论文，择要整理出来，以便于进一步展开学术研究和讨论。

目 次

卷前小语

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	1
---------------------------	---

——给北京市历史学会会员的报告

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	19
--------------------	----

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	39
------------------------	----

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	61
----------------------	----

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74
--------------------	----

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	104
-------------------------	-----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	148
-----------------------	-----

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	167
------------------------	-----

从万历到乾隆	189
--------------	-----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

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 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

——给北京市历史学会会员的报告

一 一门革命的科学

历史学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如果从三千七百年前孔子作《春秋》的时候算起，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比欧洲人所称道的世界历史学的鼻祖、希腊的历史家希罗多德还要早三百多年。中国历代有许多杰出的历史家，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中找出客观的规律性，把历史的研究工作第一次变成为一门科学，这却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历史的研究，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就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做了深刻的研究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步发展，它的列宁主义阶段，它在中国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都是对于新的历史情况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新的概括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一步，历史科学也随着向前发展一步。

当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和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且越来越自觉地运用这个规律以指导社会变革的实践的时候，历史科学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了。这门科学的任务，总的来说，不但要能够正确地说明社会，而且要帮助人们去改造社会。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应该肯定，历史科学是实践的科学，是革命的科学。因此，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必须符合于革命的需要。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就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他找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态度和一切旧的历史学家的态度完全不同。旧的历史学家常常宣称他们的研究工作仅仅是对历史材料的记录和整理，仿佛他们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实际上，无非拿这种好听的话做标榜，来对人民群众灌输反动历史观而已。这样的历史研究工作当然只符合于剥削阶级维护他们自己统治的目的。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事实证明，历史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它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科学，研究历史的人如果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研究的结果就决不相同。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过：“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的——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由于剥削阶级立场的限制，旧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就不

能不带有片面性。他们对历史的研究不能不在统治阶级所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至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就更明显地沦为垄断资本家的文化奴仆，它已走向极端反动和堕落的道路，根本不能称为科学了。这样说，是不是对于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的过分轻蔑呢？完全不是。这是根据事实做出的判断。

以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大国美国的例子为证：一九五九年一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季刊，在第一篇的地位上，刊登了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瓦·普·韦勃在美国历史学会第七十三届年会上的演说，题目是《作为高级冒险事业的历史学》。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学家的代表，现身说法，介绍了他如何进行历史研究以及如何爬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这样高的地位”。他说，他原来“想当作家没有成功”，但是后来为了生活，“受雇”于得克萨斯州油矿公司垄断资本家，为他们编写得克萨斯州一个浪人集团的历史。进一步他就编写得克萨斯州的历史了。他说，他“呆在得克萨斯州乃是投机投得对”，也是“一个巨大的冒险”。他认为这种冒险生意，“好象一个人和别人签订了合同，要赶三千只羊走过一百五十英里的荒野一样”。但是，这种冒险生意却使他赚了不少钱，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派拉蒙公司还把他的著作拍成了电影。他夸耀这种冒险使他能够“解决经济的困难”，“追求个人的兴趣”，“赚了不少钱”。这个高级冒险家的讲演，充分地暴露了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界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彻底堕落，他们已经完全变成了垄断资本集团的最卑贱的奴仆和摘客。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的这种“高级冒险事业”的形成，如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一样，它们都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都是帝国主义走向死亡的反映。帝国主义一方面驱使它的学术文化事业伴随垄断资本从事投机和冒险，另一方面驱使现代修正主义者披着马

克思主义的外衣，贩卖美国的世界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等等货色。

显然，在现代历史学领域中存在着两个根本对立的理论阵线：一个是正确地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阵线；另一个是没落的现代资产阶级以投机冒险为能事的历史科学阵线。这两个阵线的尖锐的思想斗争，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历史学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离开了阶级斗争就不能了解历史，同样也不能了解历史学。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不管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如何强词夺理，力图掩盖阶级斗争及其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反映，历史学领域内的斗争，实际上是同各个阶级的政治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学界过去的斗争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每当革命的转折时期，历史学领域内就必然引起激烈的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以前，中国历史学论坛上就展开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大论战。胡适之、梁漱溟等人当时大讲什么“东方文化”、“精神文明”、“孔子精神”、“好人政治”等等，胡适之又在“整理国故”、“少谈主义”的幌子下搬弄美国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而恶毒地攻击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是很危险的”、“是没有用处的”。当时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同志有力地批驳了实用主义唯心史观的反动理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特点，粉碎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为我们党的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据。

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方面是革命更加深入，另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围剿”更加猖狂。在这种形势下，就出现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托派分子严灵峰之流硬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就抹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其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资产阶级反动历史学家如陶希圣之流，则把中国社会称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他把明朝以来和中国通商的外国商人一概叫做帝国主义，他还说中国没有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只有所谓“士大夫阶级”才是封建势力。这些人的一切胡言乱语，目的都是为了反对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场论战继续发展扩大，后来又成为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当时一批反动的历史学家有的竟然否认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度的存在，有人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周朝就已瓦解了。德国人民的叛徒魏特伏格尔和日本法西斯的历史学家秋泽修二之流，更公开地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说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并不阻碍中国的发展，甚至于说只有外来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这许多中外反动历史学家的奇谈怪论，实际上都是抹煞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否认中国革命的必然性。我们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要注意揭发和批判这类反动理论的任何表现。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坚持历史科学的革命阵地都有重大的意义。在今天，以正确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同样可以对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生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当然应该正确地解答为什么我国会出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国的一穷二白的历史根源何在？这些问题只有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给以科学的解释，才能使人们认识清楚。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

的报告中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98页）毛泽东同志后来又再三指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武器，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科学的无价之宝，是对于中国历史科学的伟大贡献。我们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学习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找到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锁钥。

二 抓住中国历史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指出必须研究中国历史的特点，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这就给了我们打开中国历史科学之门的一把钥匙。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一开始就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回答这个问题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接着，毛泽东同志就详尽地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点。他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而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后，中国又“逐渐地变成了

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分析当时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由此，毛泽东同志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毛泽东同志在对中国历史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概括之后说：“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掌握了中国历史的特点，才能有的放矢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否则即便口口声声夸奖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支好箭，却不能用它来射中国革命之的，那又有什么用处呢？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因为他抓住了中国的历史特点，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紧紧地结合起来。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制定了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在《中国革命的战略》等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按照中国的历史特点，指出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个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矛盾很多，封建势力割据，造成长期的不统一状态，有利于革命力量以弱敌强，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具体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由此产生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胜利地建立了农村的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事实证明，抓住了中国的历史特点，革命中的许多问题就都迎刃而解。

中国革命的敌人，极力抹煞和歪曲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根本否认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借口“中国国情特殊”，向马克思列

宁主义进攻，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向中国革命进攻，那是不足为怪的。奇怪的是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人因为不懂得中国的历史特点而机械地搬用外国的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人，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历史特点，对西欧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只是一知半解，就凭他们的主观武断，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不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因而他们完全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变成了投降主义者。后来我们党内出现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同样是由于那些同志不懂得中国的历史特点，照抄外国经验，只知城市起义，看不起几亿农民的伟大力量，甚至反对农村根据地，反对游击战争，诬蔑革命的游击战争为“流寇主义”。归根结底，“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都是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学说当做抽象的教条，以代替关于中国历史的具体分析，因此，他们只空谈一般的革命理论和各国的共同规律，并不了解这些共同的规律是从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许多特殊规律中概括出来的。他们离开了自己祖国的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不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不进行具体分析，因此，他们即便知道一些抽象的一般的理论原则，也是没有用处的。何况离开了具体的特殊的规律，实际上也就没有什么抽象的一般规律之可言了。

反过来说，我们紧紧地抓住中国历史的特点，正确地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恰恰能够更好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因为任何特殊的规律，都是共同规律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的学说是从人类无数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抽取出来的，我们用它来指导革命，就应该让它回到具体的实践中去。这个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对于我们革命

和建设的实际工作是必需的,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包括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内,同样是完全必需的。毛泽东同志抓住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就抓住了全部问题的关键,这无论对于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或是对于历史科学以及其它学术的研究来说,都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无价之宝。已经被人认识的客观真理,说起来并不稀罕,但是要发现它和掌握它却很不容易。经过中国长期革命实践的考验,人们完全应该懂得中国历史的特点是决不可忽视的,由此也应该更清楚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正确。

在我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着重地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99—500页)毛泽东同志这一段话是十

分精辟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有几点特别重要：

第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遗产，而且具有显著的特点；

第二，中国的现状，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要了解现状，必须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来考察；

第三，反对空洞抽象的教条主义和八股公式，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

第四，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以批判和总结，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新的创造。

这几个论点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从这里，我们不但知道应该善于抓住中国历史的特点，而且可以知道应该怎样去抓住中国历史的特点。

但是，必须指出，我们说要抓住中国历史的特点，这和“特殊国情论”毫无共同之处。“特殊国情论”者实际上恰恰是抹煞了中国的历史特点，他们离开了共同的规律来谈特殊性，其结果就是抹煞了一切客观规律，变成纯粹的主观臆断。他们有时非常勉强地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个别的例子来证实他们的主观臆断。例如有人从史料中找到元明清以来许多达官贵人各有家德若干的记载，便断定中国奴隶制度长期存在。这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序言中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其实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呢？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我们进行历史科学的研究，必须从大量的普遍的事实出发，决不能片面地抓住一两个例子滥加臆断。我们所说的中国历史的特点，是从分析大量普遍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它符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

同规律，但又不是抽象地刻板地与共同规律相一致，也不是完全离开共同规律终于毫无规律可循的所谓“特殊国情论”。

我们承认作为共同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来把握的中国历史的特点，就是承认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从来不懂得这种关系，他们言必称希腊、罗马，除此以外，都无足道。你说奴隶制度，他就只承认希腊、罗马是典型，至于中国和其它国家历史上的奴隶制度都被说成是“变态”或者是“亚种”。其实，中国的奴隶制度也是一种典型，是中国的典型。典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应该说，中国的奴隶制度是很典型的，并非只有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才是典型。这些人言必称希腊，又好为人师，而我们有的同志也竟然受其蒙骗，甚至受了传染。其实他们对于外国历史的知识也是不多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已经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有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这是一种极坏的作风，这种人是不能研究历史的。

总之，我们要在肯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的前提之下，来研究作为这种共同规律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的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